

苏共亡党亡国暴露出来的体制的致命弱点，是中共制度建设必须克服的。我们不妨从“历史周期律”来梳理这个问题。

1945年，黄炎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。他看到一片团结平等，朝气蓬勃的新气象，认为中共是天命所归。他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：中共是否能避免历史上各朝各代由盛到衰的“历史周期律”？毛信心十足地回答“能”，给出的理由是“民主”。

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建苏维埃政权时，也坚持民主的原则。后来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体系，埋葬了列宁人民的民主初心。中共承袭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，于是乎两党都背离了民主。

究其原因，在很大程度上同先锋党的性质有关。先锋党的基本任务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动员、组织、教育群众，以带领人民奔向未来既定目标；民主却让“落后”的人民用选票来决定政治走向。

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，在大规模工业化中有优势，这是中苏两国的经验已经证明的。然而，这个体制的先天性缺陷，为以后共产党国家纷纷倒台埋下了祸根。我们权且称其为“斯大林魔咒”，它在上中下层各有不同态的表现。

过度依赖领袖致制度化低落

在顶层它表现为“伟大领袖模式”。苏共初创时，列宁的人格魅力是这个模式的源头。列宁之后的斯大林缺乏这种魅力，靠权力斗争慢慢掌控了最高权力。在此过程中，他消灭了十月革命几乎所有的其他领导人，之后还不得不依靠搞清洗和个人崇拜来维持地位。

庞大的官僚体系只听命于最高领袖，如果领导得力，这个体系能调动力量办大事；但对领袖的依赖也造成它的制度化（institutionalization）程度低，比如文革中毛泽东可以砸烂所有的机构和规章制度，打倒多数“当权派”，却仍牢牢掌控局势。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打破“斯大林魔咒”

这个模式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是权力交接，前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危机，大多发生在这个节点上。“伟大领袖”的供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后代“伟大领袖”凤毛麟角，可遇不可求。那些并不怎么伟大的领袖上台后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不断整肃，强调忠诚和纪律。其他副作用包括个人崇拜、反理性思维、偏执的狂热、政局不稳定等等。

在中层，斯大林魔咒主要表现有两个：一是中共所谓的官僚主义“肠梗阻”；二是特权阶层的滋生。这是个权力体制，中层官僚缺乏自主权，一切以上面马首是瞻。上面管束严时，他们担惊受怕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他们的惰性使再强势的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，也免不了层层减压变调，到了下层效果几乎耗散殆尽。

如果上面压力不大，他们就会各行其是，各逐其利，对上阿谀奉承，对下趾高气扬，官官相护形成一个腐朽的特权阶层。苏联解体与中层的堕落直接相关；苏共党员普遍丧失理想和信念，也是他们的榜样导致的。当大多数人入党是为了加入这个特权阶层时，共产党就变质了。

在下层，斯大林魔咒的集中表现是，“人民政府”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保障。官民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官员对百姓既可以“作威作福”，也可以“做牛做马”。无论是“民主”还是“为民做主”，都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。他们对上不对下负责，百姓对他们的仕途没有制度化的影响，因而作威作福是自然的；即使是做牛做马，也是心甘情愿的少，做给上面看的多。

基层党员干部是党的门面，他们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政权的声誉与合法性。如果他们营私舞弊、破坏公平正

义成了常态，就会酿成百姓的仇官情绪。这种情绪是苏共倒台的火药库。

毛泽东对这个体制的缺陷看得很清楚。“反修防修”、维护政权的人民性，成了他晚年政治生涯的重心，也是他的未竟事业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共上下专注于发展经济，但也进行了一些探索，比如放权让利、村级选举、协商民主、干部选拔搞“民意测验”等，但都不成体系。

当前习近平的大规模制度建设，就是企图超越斯大林模式。他“全面从严治党”的主旨，是恢复列宁式先锋党的本性。如果吸取教训和创新不足，就有可能再次钻入魔圈。

顶层破咒可参考谏官传统

顶层改革主要通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，来摆脱“伟大领袖模式”（本人于2020年7月24日在《联合早报·言论》发表的文章《政治如何现代化》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）。这就要求摒弃将最高领导人装扮成神的陋习，使庞大的党政体系运行靠制度而不是靠个人，靠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个人专断。这样方能避免伟人领袖所带来的“伟大灾难”，最高领导人也不用再假充全才和半仙。他的权威来自制度而不是吹捧和打压，加强制度就是强化权威。

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体领导成功的不多。三驾马车下的苏联了无生气，因循守旧，各方面都陷于停滞；改革中的越南的实践似乎还可以，但在中国形成了“九龙治水”的局面。这不是集体领导的原则错了，而是尝试得不够，坚持下去总会找到可行的办法。中国历史上占主流的是集体决策——皇帝每天的早朝为的就是这个；“三顾茅庐”现在几乎不可想象。

还有，这个体制对最高层权力的监督一直是个空白，这方面中国有历史悠

久的谏官传统可资借鉴。建立和扩展谏议机构和议政平台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，有助于顶层破咒。

中层解咒要靠精简机构、转换职能来克服计划经济的传统；也要靠适当放权，让干部有施展抱负的空间。紧箍咒下多出庸官、懒官和贪官。以中国之大，连毛泽东也没有要求整齐划一的“看齐”，也没有搞“四个意识”“四个自信”“两个维护”。长期、持续地强调这些，就说明斯大林魔咒仍在作祟：后代领导人达不到毛的地位，但体制要求他们像毛那样行使权威。毛可以收放自如，而他们面对各种势力的明枪暗箭，则举步维艰。

下层解咒可以试行基层干部的“双循环”，使他们扮演与历史上士绅阶层类似的角色：既代表皇权，也代表乡土利益，在二者之间搞综合平衡。他们既参与官场的人事循环，也是本地精英的一部分，在当地有威信、名望、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，参加本地的精英循环。这样他们就不会只是两眼向上，不问当地群众的死活。
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施政理念，须在制度上和切身利益上有所体现。信任投票的制度也值得一试，让老百姓对官员的仕途有一定的发言权，以杜绝边腐败边升官的现象，保证干部任免与民意同步。双循环要求恢复一些历史上的基层社会自主、自治的特征，使官场之外另有天地来施展抱负，打造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接触带。

在当今中国，警察国家有很大的诱惑性——各种手段、设施和组织机构都是现成的，但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拒绝它。这一点斯大林没做到，而毛泽东做到了。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有一整套联系群众、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的

制度和办法。

改革开放后，除了在扶贫这个共产党传统的强项外，这套办法基本不用了。这些年来大刀阔斧的反腐深得民心，但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反腐倡廉的制度性因素，是拍手者而非动手者。毛时代的一些传统和精神，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。

目前，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建设中，有三个方面最值得关注：依法治国、从严治党党和反腐。长远来看，法治最有可能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改观，尤其是保障平等人权，护住人格尊严的底线，不使任何人因怕而违心。后二者结果难料：从严治党是否对抗得了执政党随时都在经受权力的腐蚀？反腐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期间大规模、高烈度反腐并不少见，但腐败总是能反弹，成为历史周期律的一个主要根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制度建设也容易陷入斯大林魔咒。有效率的制度建设须要集权来搞顶层设计，而各方博弈妥协得来的，往往是掺水的制度，但“伟大领袖”往往超脱于制度。正式制度须要组织文化的维护才会有生命力。正式制度可以一夜之间制定出来，组织文化则须要长期培养。

如果领导人不遵守正式制度，组织文化就无法成长，正式制度也会随着他退出历史舞台而灰飞烟灭，留下的仍然是人治。因此，集权的目的不仅是建立起各项制度，还要推动这些制度真正成为权威；强调的应该是制度本身的价值，而不是它对权势人物的利用价值。

习近平是个实干的人。他的制度建设有一个远景蓝图，这就超越了他的前任。人们可以争论这个蓝图（包括其中的一些措施），是否适合国情和大势，但它终结了持续了很久的游移彷徨的局面，召回了社会主义之魂。人们有理由期待他留下一个比“隔代指定”更合理、更有持续力的权力交接制度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